

明清儒家“奉祀型書院”的建立和發展*

賀晏然 褚國鋒

[提 要] 明清朝廷陸續設立聖賢奉祀後裔,以“嫡裔奉祠”的制度要求確認了一批奉祀建築。其中,有近三十所奉祀建築被冠以“書院”之名。相較於學界此前基於書院祭祀功能提出的“祭祀式書院”概念,以“奉祀型書院”重新定義和考察這些書院,可以細化此類書院建立和發展的制度背景,進而探查書院經營的行為邏輯。書院的儒家祭祀活動在北宋已存,元代則得到制度和家族的支持,但明清以前的書院祭祀與明清以聖賢奉祀制度為基礎、奉祀生設置為目的的“奉祀型書院”仍存在差異。明清以來的聖賢奉祀制度和“奉祀型家族”的發展,助推了此類書院的發展。奉祀型書院的祭祀、教育等功能在制度要求和地方傳統之間不斷調試,最終形成以衍聖公府為代表的家族化發展模式。同時,為了適應聖賢奉祀制度的要求,書院建築也出現了專祠化、祠廟融合、虛擬等現象。

[關鍵詞] 奉祀型書院 儒家祭祀 奉祀生 聖賢後裔

[中圖分類號] B249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0874 - 1824 (2025) 02 - 0102 - 09

明清時期,朝廷曾為儒家聖賢祠廟、墓地等設置了聖賢後裔奉祀生,以承擔儒家祭祀建築的奉祀活動。儒家聖賢祠墓之外,嘉慶《欽定學政全書》的“承襲奉祀”名單還載有近三十所設置有奉祀生的“書院”。^①這些書院屬於聖賢奉祀制度和書院傳統相結合的產物。此前的研究將尼山書院、洙泗書院等視作“祭祀式書院”的代表^②,即“以祭祀文化名人為主而無教學或教學較少的書院”^③。此種分類主要基於書院的活動內容與功能屬性,未曾關注這類書院在明清時期持續建立和發展的制度因素,也未注意到這類書院奉祀建築的建設目的與性質的結構性變化。

近年來對明清先賢奉祀制度史和清代儒家“奉祀型家族”的研究使得從儒家奉祀角度重新認識這類書院成為可能。^④本文以“奉祀型書院”的概念來重新界定這些被納入明清奉祀制度框架下的書院,考察其演進歷程,分析其發展特點。這些書院的祭祀活動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宋元以來書院祭祀展開的趨勢^⑤,同時,更反映了明清聖賢奉祀制度對書院及其背後地方社會行為邏輯的形塑。奉祀型書院或經歷了家塾、書院、專祠、廟宇等複雜的變化過程,承襲奉祀的家族在不同的地域社會尋得了與官方崇儒政策接洽的方式,使族人保有書院承襲奉祀的機會。在明清奉祀型書院發展的過程中,受到制度要求和地方社會祭祀傳統的影響,出現了專祠化、祠廟共存、虛擬等特殊的文化現

* 本文係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明清儒家先賢祭祀研究”(項目號:20CZS033)的階段性研究成果。

象。基於明清儒家聖賢奉祀制度來研究“奉祀型書院”，可以補充和豐富學界對明清書院時空分佈、修建目的、活動特徵等的既有認識，為明清書院發展的複雜性提供制度史和家族史視角的解釋。

一、明代以前書院祭祀的發展

學術界通常認為，制度化的書院出現於北宋。^⑥供祀是書院的三大事業之一。^⑦書院祭祀空間的出現意味著書院的“廟學化”，標誌著書院教育的成熟。^⑧北宋初年，岳麓書院、白鹿洞書院已有祭祀空間，孔門聖賢開始成為書院祭祀的核心對象。^⑨

追索明清奉祀型書院的前史可知，雖然祭祀孔、孟、言子等聖賢的書院建築早有，但其性質並不明確，祭祀活動也不普遍。尼山書院的前身在北宋“即廟為學”，重視孔子祭祀。慶曆三年（1043），孔子第四十六代孫孔宗愿“作新宮有廟，有夫子之殿，有夫人之位，有講堂，有學舍，有祭田”^⑩。聖澤書院始建於北魏孝昌元年，北宋元祐四年重修。^⑪河南開封游梁書院屬孟氏，“創於宋”^⑫。言子書院在南宋時設立，名“學道書院”。陳宜中在《學道書院記》中講述了學道書院的由來，期望藉此弘揚言子之學，“宋興，崇文尚治，吾夫子之祠遍天下。……吳為今輔郡，公實東南道學之宗也。吳故有祠，紫陽先生嘗記之矣。而郡則未講，……三閱月而堂成，請於朝，扁以‘學道書院’。”^⑬從相關記載來看，此時這些建築尚未形成制度化的聖賢奉祀傳統，其教育面向大於祭祀需求。

及至元代，書院與儒家祭祀之間的關聯進一步深化。要而言之，元代書院被納入官學體系，先賢祠祀成為書院的一大特質。^⑭元儒黃潛云：“我朝尊右儒術，以風厲乎海內，聞者莫不知勸。……其為書院者，遂與州縣學參立，而布滿於四方。既奉濂洛、乾淳二三大儒以為先賢，而於前代名臣、山林高蹈之士，有所弗遺。”^⑮唐肅也曾言：“凡天下名書院者，有祠以祠先賢，有教以教後學，國朝制也。”^⑯

在元代書院的官學化進程中^⑰，朝廷的文治政策與鼓勵舉措發揮了主導作用，而業儒家族的托舉亦不容忽視。已有研究表明，元代的南北家族均透過興建書院來獲取身份資源。萬安玲（Linda Walton）指出：“1315年恢復科舉制度前後，士大夫家庭已通過興辦書院從而把利用教育作為維護社會地位和經濟地位的戰略。……元朝建立後，書院對南方士大夫家庭的命運起著重要作用。……元代的書院，既是國家教育機構的組成部分，也是南北方漢族士人——以及非漢族士人——通過堅持儒家教育傳統而保持地位的手段。”^⑱元代南北家族利用書院維繫自身社會地位的做法，堪稱明清時期奉祀型書院所對應的“奉祀型家族”發展模式的先聲。

部分清代“奉祀型書院”在元代有著較為明晰的前史。就北方而言，尼山書院、洙泗書院等在元代建成並有所發展。尼山書院在至元四年（1338）告成，有大殿、毓聖侯祠、學宮等建築，“繼以塑繪聖賢之像成，樂器祭器以次第成。置弟子員”。^⑲洙泗書院由孔子後代主持修建，設有禮殿、講堂等，於1338年落成。^⑳虞集撰《滕州性善書院學田記》載，奉祀孟子的性善書院初為義塾，延祐元年（1314）改稱“性善書院”，延祐二年“改築於滕之舊治。……右廟堂以祠孟子”。^㉑汶上聖澤書院、鄒縣中庸書院等書院在元代的建設歷程與奉祀活動的關係也較為清晰。^㉒

在元中後期，不僅北方書院積極展開奉祀活動，南方書院的奉祀也有所發展。黃潛《文學書院田記》稱：“至順二年，州人曹君始出私錢買地作祠宇，而辟論堂於其後，列齋廬於其旁。有司因為請於中書，設師弟子員，而揭以新額曰‘文學書院’。”^㉓由“祠宇”可知文學書院以祭祀子遊為主要目的。楊剛中在《平江路常熟州文學書院記》中強調言子故里建設書院以專祀言子的必要性，“雖春秋之事，獲俎豆於夫子之堂者遍天下，然其鄉無書院以專祀之，則於理有不當然者。”^㉔又如，專祀

范仲淹的吳縣文正書院,李祁撰《范文正公書院記》載:至正丙戌,吳秉彝等奏改祠為書院,不設教官,以范仲淹子孫居嫡者世主之。^⑤

在元廷書院政策的影響下,部分聖賢祠廟曾假書院之名構建奉祀空間。如青浦孔氏的奉祀建築至聖衣冠墓,其在元代的揚名與書院有關。孔宅書院被後世視作青浦孔宅歷史的重要一環,“元至正間,墓中環壁光騰霄漢,里人章弼繼蔡廷秀修建孔宅書院,以待學者。”^⑥但該說的演變實際頗為複雜。郟城縣宗聖祠前身為至正年間所建“曾子書院”。^⑦至元間,寧陽西臯村複聖廟建成,“敕員奉祀”,旁修常川書院一所,以廟祭祀顏子,以書院傳揚顏子之道。^⑧這些書院此後復以祠墓、祠廟之名行世,但元代書院政策一度為聖賢後裔家族兼顧祭祀和族人教育提供了便利。

總體而言,追溯明清奉祀型書院的宋元前史,可以發現書院的祠祀功能從北宋逐漸顯現。先聖、四配和南方先賢代表言子的奉祀活動和相應建築最早形成。這些建築包括家塾、家祠、學宮、書院等不同形態。到了元代,官方政策主導了書院的“祀事”,南北家族亦積極參與其中,書院性質和聖賢祭祀空間初步建立。此後,在明清聖賢奉祀制度和“奉祀型家族”的支持下,部分書院與奉祀制度相結合,構成了明清“奉祀型書院”的主體。

二、聖賢奉祀制度與明清儒家奉祀型書院

明清時期是書院進一步普及和繁榮的階段,^⑨書院配合地方儒學景觀和聖賢記憶的建構,形成關於書院奉祀的豐富敘事,進一步將聖賢奉祀的意義固著在書院的建築空間和歷史敘事當中。更重要的是,明清時期逐漸成熟的儒家聖賢奉祀制度使得奉祀後裔和祭祀建築之間息息相關,一類以聖賢奉祀制度為基礎、奉祀生設置為目的的“奉祀型書院”成為了聖賢奉祀祠廟之外的空間選擇。

“奉祀型書院”是明清聖賢奉祀制度與書院傳統及建築結合的產物,其目的在於契合儒家聖賢祭祀的制度要求。這類書院設有專司奉祀的聖賢後裔,以服務於書院奉祀這一核心功能。宋代家族建設、優待勳臣等觀念助推了賢儒專祠奉祀生的出現。^⑩明清以前的奉祀生設置並非集中於聖賢後裔,增設也多出自帝王或地方官員的個人意志。到明清時期,聖賢奉祀改由朝廷主導,奉祀活動逐漸制度化。明代聖賢奉祀官方化的表現之一是授予聖賢奉祀後裔世襲翰林院五經博士。除南北孔氏外,朱熹、程頤、顏回、孟軻、劉基、周敦頤、曾參、張載、邵雍、程顥、仲由等人的後裔也被封為五經博士。^⑪雖然五經博士並無職掌,但獲得此頭銜的族支屬於被禮部承認的嫡系,家族祠堂也會被授予官方地位,他們有權要求官府撥給祭田、增設廟戶,無形中強化了家族的社會聲望,提升了本支在家族和地方的地位。明代將儒家聖賢奉祀後裔納入中央管控,是清代奉祀制度擴展的先聲。

清代不僅授予聖賢後裔五經博士,還大量設置奉祀生員,將這一受到禮部認證的奉祀身份推廣到更多的聖賢後裔家族,使得儒家祭祀活動進一步納入國家祭祀體系。負責書院奉祀的奉祀生也屬此類生員,他們雖不用參加科舉考試,但必須是儒家聖賢後裔。在承擔奉祀的過程中,奉祀生及其家族可以獲得科舉和經濟等方面的益處。例如,奉祀生因特殊身份而免除賦役、得到任用,奉祀建築可以獲地方官府撥款撥地等。聖賢後裔家族為了增設奉祀生,按照朝廷規範重編族譜,重修奉祀建築,其中也包括書院。因奉祀型書院主要服務於奉祀活動的展開和奉祀生的設置,它的設置目的、建築空間、發展過程都與普通書院有所不同。

(一) 奉祀型家族與奉祀型書院

在明清聖賢奉祀制度的演變進程中,“奉祀型家族”是奉祀政策落實的重要助力,^⑫家族在元代書院奉祀活動中的角色或隱或顯,但晚明以後逐漸成為奉祀書院建設的輔助。明代衍聖公府名下

的書院表現較為明顯。除了書院奉祀生，衍聖公府還另設職守管理書院。“孔氏北宗一員，奉中庸書院祀”，為翰林院五經博士之一。此外，“太常寺博士一員，正七品，奉聖澤書院祀。未審建置之始。國朝順治元年，山東巡撫方大猷題准依前明舊例，以衍聖公第三子承襲。”另，“國子監學錄二員……一奉尼山書院之祀，一奉洙泗書院之祀。”³³奉祀生配合這些職官，滿足衍聖公府名下奉祀書院的日常管理和禮儀需求。晚明孔氏書院建設、教育、祭祀等活動中也可見到奉祀生的身影。衍聖公府在明代尼山書院的修繕活動中較為活躍。“明永樂中，五十九代衍聖公率族人增建啟聖殿及寢殿於西偏”³⁴。

明代曲阜之外的奉祀書院多由地方官府主導修繕。如聖澤書院“明世宗嘉靖二年，巡撫山東都御史陳鳳梧檄知縣吳瀛移建城中。穆宗隆慶元年知縣趙可懷，神宗萬曆元年知縣張惟誠，二十八年知縣尚瓚，先後重修。”³⁵萬曆年間嘉祥知縣田可貢撰《鼎建宗聖書院碑記》提及宗聖書院也是由地方官府主導修建。³⁶常熟言子文學書院在明代的復興也是以地方官員為主。嘉靖初年言氏嫡裔已然“下同編氓，貧窮不能自立”，萬曆時常熟知縣耿橘重立書院，並期望言福等言氏小宗子弟可以傳承和踐行言子學說。³⁷家族雖在明代奉祀書院的重建活動中不常現身，但書院復興的意義通常與家族緊密纏繞，所謂“祀公而教育其子孫”³⁸。

隨著清初奉祀型家族的進一步擴展，家族的活動能力開始由傳統的儒學家族推及南北的業儒甚至商業家族。山東以衍聖公府為代表的聖賢家族保持著對奉祀書院的持續影響。如鄒縣尼山東麓的尼山書院，“國朝康熙十三年，六十七代衍聖公又加修飾，易圍牆以磚石。雍正二年，六十八代衍聖公以歲久漸圯，更為鼎新。乾隆二十年，今衍聖公昭煥復率族人出資重修。”曲阜城東北的洙泗書院，“國朝順治八年，六十六代衍聖公復加補葺。十三年，六十五代孫、曲阜知縣衍淳，康熙三十八年，六十六代孫、曲阜知縣興認，皆捐俸重修。”此外，汶上縣聖澤書院、鄒縣中庸書院等也都在清代經歷了衍聖公主持的重修工作。³⁹

南方書院的重修在清代也開始轉向奉祀家族主導。以江蘇的奉祀型書院為例：常熟言子文學書院在康熙四十六年重修，康熙五十一年言德堅獲授五經博士，言氏的奉祀生數量在雍正年間得以擴充。此後文學書院的重修基本由言氏家族負責。⁴⁰金匱朱子嵩山書院建設於乾隆年間，乾隆三年（1738）設置奉祀生。范仲淹文正書院的修葺事項基本由族裔主導。“康熙二十年，裔孫浙江巡撫承謨修。三十四年，裔孫兩江總督承勳修。……乾隆二年，裔孫太學興禾、大同知府瑤重修。”⁴¹

南方家族的商業背景對書院建設也有所影響。如被納入無錫嵩山書院奉祀的朱氏族人，本為宋村朱氏家族的邊緣族支，但由於善於經商和經營姻親關係，展現出不一般的家族建設能力。同在金匱縣的錫山書院主要由徽商經營，可能在康熙年間已經設立奉祀。⁴²這些家族呈現較強的經濟實力和靈活的奉祀手段，與晚明江南地區商業發展的活躍環境相呼應。隨著聖賢奉祀制度的完善與推行，聖賢名下書院多在康乾間增設奉祀生。這不僅是對書院奉祀職能的肯定，也為家族進一步參與奉祀書院的日常活動提供了渠道。

（二）承載聖賢記憶的奉祀型書院

奉祀型書院不僅是獨立的禮儀建築，而且逐漸融入地方聖賢遺跡系統。明清時期，奉祀書院與新舊聖賢景觀的結合成為新議題。在聖賢奉祀過程中，地方文士開始關注對聖賢遺跡的發掘。如對尼山景觀與聖裔關係的構建，通過孔聖後裔、在地官員和地方文士的思想言說，以及他們不斷塑造相關祠廟、墓地和書院等“聖跡”的行為而得到強化。地方文士有意識地調和歷史記載中的矛盾或不實，自覺塑造和凸顯這些文化資源與本地風俗、文教的密切關係，同時藉助這些文化資源進行

儒學化的論述。在法國歷史學家皮耶·諾哈(Pierre Nora)看來,“[歷史]是記憶,而不是回憶,是現在對於過去的全盤操作與支配管理。”^{④3}聖賢記憶也是基於當下需求的建構,而不是再現。地方社會和奉祀家族的需求影響著對聖賢遺跡的選擇性記憶,反映出史實之外認同建構的過程。

森正夫所提出的地域社會概念有助於進一步理解奉祀型書院在聖賢記憶空間中的角色。“地域社會是貫穿於固有的社會秩序的地域性的場,是包含了意識形態領域的地域性的場。”^{④4}這種地域性的場由身處其中並彼此認同的人們創造和維護。對包括書院在內的聖賢遺跡的文化記憶與空間塑造,也可以構成儒學的“記憶之場”。奉祀書院和其他奉祀遺跡共同構成承托儒家文化的具體場域,反映著地方知識分子對歷史與現實的思考。這種區域化的儒學景觀構建,在南北聖賢奉祀型書院建築中均可見到。子思書院便充分體現了這種記憶塑造的過程。子思書院位於孟子奉祀集中的鄒縣,傳說為思孟授受之地,元貞元年建中庸精舍,後創立講堂等建築,大德六年通名為“中庸書院”,延祐二年改名“子思書院”,“設山長以司祭祀及教事”,永樂中徙置暴書臺東。^{④5}《聖門十六子書》關於子思書院的記載轉錄自《三遷志》。^{④6}這一書院建築應即嘉慶《欽定學政全書》中提及的中庸書院,專祀子思子,“矧述聖子思子無專廟,以我邑中庸書院為廟”。^{④7}元代文人將子思子遺跡、孟子傳說與孟子遺跡相關聯,“以文化地景的形式在空間中打造出思孟之道的源流。……這一空間通過命名得以形成,又通過互文與各種歷史典籍連接,成為追溯思孟學說的記憶之所和空間載體。”^{④8}這一思孟空間經地方官府、儒生群體及聖賢家族的認可與建設而逐漸凝結為在地場域與地方集體記憶。明正德年間授衍聖公次子世襲五經博士之職以奉中庸書院祀,清代另設奉祀生六名,中庸書院奉祀在思孟空間中的地位愈發凸顯。

此外,明清對洙泗書院、春秋書院的聖賢記憶也顯露重建意圖。洙泗書院在至元時已“設山長一人奉祠”^{④9},明正德間一度衰落。在嘉靖年間的重修^{⑤0}過程中,地方官員與文士所撰碑記詩文等對“孔子講堂”與“洙泗之間”的關聯予以闡發,將先聖記憶與書院空間之間的聯繫予以固化。^{⑤1}另據研究者考證,清康熙二十三年“幸魯聖典”促成了春秋書院後來的改修,孔尚任所論“春秋台”方案得以落地,乾隆時已有“春秋書院即春秋台”的說法。^{⑤2}“孔子作春秋處”從傳說轉變為春秋書院歷史源頭以及現實地標,同孔尚任等對孔聖記憶的闡釋密切相關。

在制度和家族的加持下,奉祀書院隱然成為地方書院建設的模版,開始影響其他聖賢書院的建設邏輯。如清代石門書院,雖未進入朝廷的奉祀名單,但也由衍聖公府負責管理和祭祀。乾隆《曲阜縣志》載:“石門書院在董家莊,以近石門山故名。舊為三教堂,聖裔毀釋老之像,獨奉夫子,易今名。歲亦以市稅為春秋享祀之用,以四氏學教授、學錄主其祭。”^{⑤3}嘉慶十四年(1809)的一則公文載:“緣曲阜董家莊,舊有三教堂一座,乾隆九年奉旨飭禁。隨將三教堂改為石門書院,獨奉至聖先師,使四氏學尚主其祀。”^{⑤4}據此可知石門書院的設立應在乾隆九年(1744)或稍後,正是儒家聖賢奉祀興盛之時。石門書院獨奉夫子,密切配合朝廷政策,有助於社會教化。四氏學教授、學錄對祀孔活動的主導既保證了石門書院與儒家聖賢奉祀的密切關係,也強化了石門書院與衍聖公府的關聯。這座書院雖然不在奉祀生名單內,實際享有的祭祀環境與儒家奉祀型書院一般無異。^{⑤5}奉祀型書院呈遞朝廷奉祀政策的建設邏輯由此可推廣到更為廣泛的地方書院建築。

由上述明清奉祀書院的例證可知,明清儒家聖賢奉祀制度深刻影響了奉祀型書院的建設和發展。實踐奉祀的基層單位“奉祀型家族”在書院建設中逐漸扮演重要的角色,通過對地方聖賢記憶的重構,奉祀書院開始成為地方儒學景觀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為了能夠增設奉祀,奉祀書院可能與祠宇一樣,經歷過為滿足奉祀生增設要求而進行的改建。例如,性善書院在元代隸屬於學宮,

明代天啟間移建。性善書院“內有存心堂”，^⑤而“孟子存心堂”在嘉慶《欽定學政全書》中是獨立的奉祀建築，設奉祀生二名。^⑥存心堂與性善書院分設奉祀生，是符合家族增設利益和豐富地方儒學敘事的雙贏做法。聖賢後裔家族為滿足制度要求而採取的務實思路深刻影響了明清奉祀型書院的發展邏輯，也無形中激發和拓展了地方聖賢文化的表達路徑。

三、儒家奉祀型書院的祠廟化

明清書院建築在適應賢儒奉祀制度要求的過程中，出現了一些特殊的文化現象，如專祠化、祠廟融合、虛擬等。為保障奉祀功能，部分奉祀書院逐漸廢棄學舍，以確保祠宇的完備。部分書院為設立奉祀，借用寺觀、會館等非書院建築並使其“儒家祠廟化”。如無錫朱氏的錫山書院和嵩山書院便是如此。部分書院甚至有名無實（未曾建設）。山東衍聖公府名下的一些書院就採取此種方式擴展奉祀生名單。這充分反映了奉祀書院性質在明清奉祀政策影響下的轉變。

奉祀書院的人員屬性也有所變化。普通書院設置山長一職，往往更關注書院教育事務的管理。但是奉祀書院的山長，主要承擔“奉祠”的職責。^⑦雖然有一些書院承擔著教育本族子弟的功能，但是在儒家奉祀制度籠罩下，其被聖賢家族重視的主要原因時常在於增置奉祀生，由此造成書院建築尤重奉祀空間，整體建築性質開始向祠廟偏移或轉化。甚至有一些書院沒有建立過實體，僅是為了設置奉祀生而虛擬於紙端。如北孔名下的舞雩壇崇德書院，見載於嘉慶《欽定學政全書》，《孔府檔案》也有清雍正至嘉慶年間選補該書院奉祀生的檔案，但該書院並未實設。^⑧

對於山東以外的奉祀家族來說，由於需要接受地方官府的審核並層層上報，虛擬奉祀建築的可能性較小。但另一方面，江蘇、江西一帶的奉祀書院常依託於寺觀、家廟、祠宇等進行經營，展現出更強的靈活性。無錫嵩山書院和錫山書院就是其中的顯例。二者分別是以佛寺和會館充當書院建築，而獲得奉祀生名額。^⑨根據先賢奉祀制度規定應當承擔祠宇功能的嵩山書院，其實具有深厚的佛教背景。這與佛道對儒家祭祀空間的實際影響有關。例如，蒙元時期，岐山周公廟曾長期由道士值守。李木魯翀對此感喟：“周公先聖，在唐與孔子同廟祀天下，今乃令道家者流主祠事，非所以崇聖道昭禮典。若立書院，俾儒者主其祠為宜。”^⑩言子名下學道書院曾為僧人所佔，“元初奪於豪僧。至元間，山長和宗震輩改創之。……元末，複奪為僧舍。”^⑪“弘治間，知縣楊子器捐俸買田四十畝，給三元堂道士陸允修等收管，以供春秋祭掃之費。”^⑫由於奉祀型書院明確的儒學性質，對其中摻雜的佛道因素本尤忌諱，先賢家族需依照奉祀政策轉化江南地方宗教傳統，將佛道經營的祭祀空間改造為符合儒家傳統的書院等建築，以確保賢儒奉祀建築能夠穩定傳承。

奉祀型書院通常以祠廟為核心建築，而擔負教育、收藏等功能的建築一定程度上被忽視或廢棄。前述言子文學書院就是一例。為符合家族奉祀的要求，言子文學書院在明清時期的建設逐漸由教育與祭祀並重轉向以奉祀為主。言子書院在萬曆年間重建，名曰“虞山書院”。重修後的書院居中為子遊祠，東側為學道堂，西側的弦歌樓院落也附有子遊祭祀空間。新的書院建築格局不僅確保了講學、舉業等教育活動，其祭祀功能也有所加強。康熙年間，馬逸姿重修書院，並在《重修文學書院言子祠碑記》中提及“告爾子孫，肅奉蒸嘗。俎豆修潔，黍稷馨香”^⑬，告誡言氏子孫要嚴於祀事，同時凸顯了書院建築對言子祠祭的意義。這與《言氏家乘》對文學書院“言氏家塾”的記述相一致。^⑭雍正年間重建，之後復圯，唯有承擔祭祀功能的言子祠和莞爾堂留存，書院的祭祀功能對教育功能的覆蓋顯而易見。此後，言子後裔持續承擔對書院的修繕。及至咸豐十年（1860），只有祭祀建築言子祠獨存。^⑮在此背後是明清以來奉祀型書院承擔賢儒奉祀職責的政策要求。

江西、浙江等地的南孔書院與江蘇的情況類似，也體現了祠廟功能在奉祀型書院發展過程中的重要角色。衢州孔氏也曾借書院增設奉祀生。《孔府檔案》中收錄了杭州府錢塘縣敷文書院、永康縣信安書院、新城縣賢溪書院等處的奉祀生設置和承襲情況。這些書院在教育史上的貢獻不一，但在南孔奉祀活動的展開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乾隆十三年（1748），衢州孔氏翰林院五經博士孔傳錦造送《至聖祠廟書院額設奉祀生名數清冊》給衍聖公府，呈文提及“四十八代祖端友從宋高宗南渡，賜家於浙江之衢州府，建立專祠、家廟、書院，世奉蒸嘗，後子孫繁衍，散居於杭州省會及金華府之永康縣，並與衢接壤之鄰省江西建昌府新城縣等處，亦建有書院，共額設奉祀生二十四名。”^⑥據清冊記載，敷文書院二名，信安書院二名，賢溪書院四名。三座書院的額設奉祀生數量佔比三分之一。

雖然嘉慶《欽定學政全書》只記錄了賢溪書院，但三間書院增設奉祀生的功能是類似的。不過，孔氏主事者似乎主要關注書院的奉祀功能。乾隆十三年四月衢州造送頂補奉祀生清冊，在正文的“三衢分祠”右側補寫“新城書院”，且在補選奉祀生的行文格式和措辭上，與祠廟奉祀生揀選並無二致。在頂補奉祀生的相關描述中，奉祀生孔傳時被形容成“禮儀嫻習”，孔繼榮被描述為“少年老成”^⑦，明顯關注是否適合承擔奉祀事宜，而與書院教育功能無涉。主事者專注奉祀生頂補事項，甚至將書院名稱寫成了未曾報給禮部的新城書院，以致鬧出一樁公案。^⑧之後雖以“訛寫”為由加以糾正，但此事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主事者對書院主體功能的認知和態度。由此觀之，奉祀型書院的綜合功能讓步於增設與維繫奉祀的現實目的已成常態。

奉祀型書院的祠廟化，引起了部分清代文士對書院教育功能不足的擔憂。乾隆年間孔氏族人孔繼汾針對尼山書院等書院的狀況，曾言：“書院者，本為春秋講學而設也。今廟祀雖肅，而絃誦之聲無聞，戾厥旨矣！顧名思義，是所望於主鬯者。”^⑨這種期待奉祀型書院回歸教育功能的呼聲在江南書院中亦存。范仲淹文正書院就被批評“然課士則自明以來廢弛已久”^⑩。咸豐年間，知縣余龍光發現青浦孔氏後人多務農，特意在孔宅建立庭聞書院，“集費延師，專為孔氏家塾。二十年來有游於庠者，有貢於廷者，彬彬乎漸有成焉。”^⑪但是，奉祀型書院重歸教育的例子僅是少數，孔繼汾等人的呼籲和努力成效有限。嘉道以後，增設奉祀愈加困難，奉祀型書院作為家族發展策略的有效性下降；業已設有奉祀生的家族，多不關心書院的存廢；加上家族經濟的起伏和族支的變動，能夠在晚清繼續維持奉祀書院建築的完善已著實不易，遑論發揮其教育功能。

結語

在提出“奉祀型書院”概念的基礎上，本文嘗試勾勒儒家聖賢奉祀書院的淵源與流變。元代是此類書院建築奠基的時期，受書院政策的影響，業儒家族的身份構建和書院祭祀尋得了契合點。明清時期，隨著聖賢奉祀制度的完善，南北奉祀型書院得以發展。尤其是清代奉祀生的廣泛設立，使得奉祀型書院數量有所增長。這些實體建築的前身可能是祠墓、寺觀、會館，其轉變為書院屬於奉祀制度框架內地方傳統與家族策略調和的結果。有些書院雖被方志和政書記載，卻並未建立實體，它們只是奉祀家族為了滿足朝廷的政策需要而虛構的名義上的建築。在教育傳統之外，聖賢奉祀書院因服務於奉祀生設立，而逐漸在建築構造和性質上呈現出“祠廟化”等特徵。

對“奉祀型書院”的整體觀察可以補充學界關於清代書院復興潮流的既有認識。一般認為，清代書院的普及是官方、學術社群和民間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⑫但以奉祀生政策和家族策略為依託而實踐祭祀、教育和家族建設等多元目的之“奉祀型書院”顯然屬特例。清代是“奉祀型書院”發展

的高峰,其時空分佈與普通書院差異較大。此前研究認為清代書院發展有兩個高峰,先落在康乾時期,後在同光間。^⑭奉祀型書院在康乾間主要借助朝廷奉祀政策的支持崛起。但在後期書院復興潮流中,卻遠落於下風。這主要是因為奉祀型書院所依託的奉祀政策在清代後期受到壓制,新增奉祀生的難度越來越大,已經不再成為家族地位提升的主要選擇。在地域上,奉祀書院也呈現出與普通書院不同的分佈特點。清代書院最發達的地區當屬廣東和四川,但兩地的奉祀型書院數量為零。書院次多的浙江、江西和福建三地,^⑮僅有江西設有一座奉祀型書院。儒家聖賢奉祀型書院主要聚集在山東地區,但山東除奉祀書院外,書院數量遠低於直隸、江蘇、河南、湖南、雲南等省。與普通書院在發展時段和分佈區域上的差異充分體現了清代“奉祀型書院”特殊的發展路徑,也體現出以衍聖公府為代表的奉祀型家族對明清儒家奉祀書院建設的深遠影響。

①⑤⑦(嘉慶)《欽定學政全書》,《故宮珍本叢刊》第334冊,海口:海南出版社,2000年,第275~283頁;第277頁。

②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長沙:湖南教育出版,1994年,第816頁。

③顧明遠主編:《教育大辭典》第8卷,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第55頁。

④王春花:《聖賢後裔奉祀生初探》,北京:《清史論叢》,2018年第1期;李成:《清朝奉祀生制度初探》,北京:《清史論叢》,2019年第1期;賀晏然:《清代儒家先賢奉祀型家族的生成與擴張》,山東曲阜:《孔子研究》,2024年第3期。

⑤⑥肖永明:《儒學·書院·社會——社會文化史視野中的書院》(修訂版),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年,第334頁;第20頁。

⑦盛朗西編:《中國書院制度》,上海:中華書局,1934年,第47頁。

⑧⑨高明士:《中國教育制度史論》,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9年,第70頁;78頁。

⑩⑪虞集:《至正二年創建尼山書院之記》,楊朝明主編:《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上),濟南:齊魯書社,2022年,第380頁;第381頁。

⑫⑬⑭⑮⑯⑰⑱⑲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闕里文獻考》,第77頁;第132~133頁;第77頁;第76~77頁;第77頁;第77頁。

⑳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馮雲鵬校刊:《聖門十六子書》,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年,第426頁;第122頁;第419~420頁;第425頁。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錢穀輯:《吳都文粹續集》卷十三,《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78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

368頁。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詳見陳雯怡:《元代書院與士人文化》,邱仲麟主編:《中國史新論:生活與文化分冊》,台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第236~242頁。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黃潛:《金華黃先生文集》卷十,《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255冊,北京:北京出版社,2010年,第160~161頁;第160頁。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唐肅:《皇岡書院無垢先生祠堂記》,《丹崖集》卷五,《續修四庫全書》第1326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第184頁。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相關討論可見趙路衛等著:《中國書院通史·元代卷》,長沙:湖南大學出版社,2023年,第102~129頁。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萬安玲:《宋元轉變的漢人精英家族:儒戶身份,家學傳統與書院》,《中國社會歷史評論》第9卷,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8頁。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宋元隆:《創建洙泗書院之記》,《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上),第357~358頁。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虞集:《道園學古錄》卷八,元代史料叢刊編委會主編:《元代史料叢刊初編:元人文集(上卷)》第27冊,合肥:黃山書社,2012年,第384~385頁。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闕里文獻考》,第77頁;《嘉慶》《大清一統志》卷一百六十五,《續修四庫全書》第616冊,第290頁。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常熟言氏家譜資料二種》,第63頁;第70頁;第70頁;第47頁;第176頁。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李祁:《雲陽李先生文集》,《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第96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8年,第254頁。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㉙㉚㉛㉜㉝㉞㉟㊱㊲㊳㊴㊵㊶㊷㊸㊹㊺㊻㊼㊽㊾㊿(光緒)《青浦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上海府縣志輯》第6冊,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1991年,

第 204 頁；第 205 頁。

②⑦(乾隆)《郟城縣志》，《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第 59 冊，南京：鳳凰出版社，2004 年，第 51、104 頁；《聖門十六子書》，第 314 頁。

②⑨③④⑤鄧洪波：《中國書院史》（增訂版），武漢：武漢大學出版社，2012 年，第 274、459 頁；第 484~497 頁；第 456~458 頁；第 452~453 頁。

③⑩魏峰：《宋代遷徙官僚家族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第 165 頁。

③⑪孔瑩、王成舜：《聖賢後裔五經博士考》，濟南：《山東檔案》，2007 年第 5 期。

③⑫賀晏然：《清代儒家先賢奉祀型家族的生成與擴張》，山東曲阜：《孔子研究》，2024 年第 3 期。

③⑬《道光二十九年重修尼山書院紀恩碑記》，《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下），第 1191 頁。

③⑭曾國荃重修：《宗聖志》卷十五，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89 年，第 662~668 頁。

③⑮張鼎等撰：《虞山書院志》卷二，趙所生、薛正興主編：《中國歷代書院志》第 8 冊，南京：江蘇教育出版社，1995 年，第 50、46 頁。

④⑥⑥賀晏然：《常熟言氏與清代先賢言子祭祀的展開》，江蘇蘇州：《蘇州科技大學學報》，2021 年第 6 期。

④⑦⑦曹允源等纂：（民國）《吳縣志》卷二十七，《中國地方志集成·江蘇府縣志輯》第 11 冊，第 402 頁。

④⑧⑧賀晏然、褚國鋒：《佛寺、專祠與書院——清代無錫嵩山書院的朱子奉祀》，長春：《地域文化研究》，2024 年第 2 期。

④⑨皮耶·諾哈編：《記憶所繫之處》第 1 冊，戴麗娟譯，台北：行人文化實驗室，2012 年，第 19 頁。

④⑩森正夫：《“地域社會”視野下的明清史研究：以江南和福建為中心》，于志嘉等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17 年，第 40 頁。

④⑪呂元善撰：《三遷志》卷四，《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史部》第 79 冊，第 377~381 頁。

④⑫（嘉慶）《欽定學政全書》，《故宮珍本叢刊》第 334 冊，第 275 頁。位置見《闕里文獻考》，第 77 頁。清

代董淳撰《重修子思子祠記》，見劉培桂編著：《子思書院 斷機堂歷代詩文集》，濟南：齊魯書社，2019 年，第 228 頁。

④⑬金萍、吳宗傑：《歷史空間的文化意義接續與再生——鄒城子思祠遺址群空間意義解讀》，蘭州：《甘肅社會科學》，2014 年第 5 期。

⑤⑩《嘉靖三年重修洙泗書院之記碑》，《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中），第 706~707 頁。

⑤⑪元明文人的碑記詩文可見《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中），第 714 頁。

⑤⑫齊金江：《春秋書院考略》，《曲阜儒家碑刻文獻集成》（下），第 1499~1512 頁。

⑤⑬潘相等纂修：《（乾隆）曲阜縣志》卷七，《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第 73 冊，第 66 頁。

⑤⑭曲阜師範學院等編：《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 3 編第 14 冊，濟南：齊魯書社，1982 年，第 404 頁。

⑤⑮石門書院後被歸為曲阜書院之“關於祭祀者”，同尼山書院等奉祀型書院並列。《（民國）續修曲阜縣志》卷四，《中國地方志集成·山東府縣志輯》第 74 冊，第 108 頁。

⑤⑯《闕里文獻考》，第 77 頁；《聖門十六子書》，第 420 頁。

⑤⑰（嘉慶）《欽定學政全書》卷十一，第 275 頁；《曲阜孔府檔案史料選編》第 1 編，濟南：齊魯書社，1980 年，第 16 頁；孔侑主編：《曲阜地名志》，第 530 頁。

⑥①王禕：《王忠文公集》，《四庫提要著錄叢書·集部》第 259 冊，北京出版社，2010 年，第 263 頁。

⑥②陳穎主編：《常熟儒學碑刻集》，第 187 頁。

⑥③⑥④《孔子博物館藏孔府檔案彙編·衢州孔氏卷》（下），第 282~283 頁；第 298 頁；第 303、305~307 頁。

作者簡介：賀晏然，東南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博士。南京 211189；褚國鋒，中山大學哲學系（珠海）博士後、助理研究員。廣東珠海 519082

[責任編輯 陳志雄]